

走出殖民主义：洛苏尔多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

李雨豪，郭丽双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殖民主义在当代并没有消亡，它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生产方式伴生而行。多米尼克·洛苏尔多从哲学批判转向历史批判，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阐明了其针对殖民主义的自由观，在殖民主义尚存且现代人普遍不自由的社会背景下，他依托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进入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之中。洛苏尔多指明自由的人应当是被全面承认的，这种自由建立在个体被压迫时所具备的反抗权之上，因而在资本主义历史中被压迫者争取承认的斗争实质上是合法追求自由的途径。将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结合，洛苏尔多重塑了这一理论，以被承认为目的，一切关于自由解放的运动都可以被“复数形式”的阶级斗争所涵盖，阶级的概念事实上被拓展了。但他却走向了偏离马克思本人观点的消极自由，也没有实现对殖民主义经济逻辑的彻底批判。因此，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世界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之中，既要以人为本，又须胸怀天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多米尼克·洛苏尔多；历史唯物主义；殖民主义；承认理论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4)06-0210-11

“自由”自古以来便是中外思想家们共同研究的终极命题之一。在当今社会，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然走出资本主义旧殖民体系的笼罩，但殖民主义仍以一种世界秩序或意识形态的形式留存于当代人类文明中，由此而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正在制约和干扰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走向自由与繁荣。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显然，世界格局的“东升西降”指向了过往“西强东弱”局面的松动，因而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解放道路在今天也应当进行相应的转变。一方面，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类崭新事业实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另一方面，西方社会中亦有新的理论与实践指向人类文明的新可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关于现代人自由问题的回答将深刻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走向。那么，无论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还是立足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自由观都具有极强的现实与历史意义。

多米尼克·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 1941—2018)是一位长期以来因阶级斗争与自由主义批判理论而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的意大利左翼学者。一方面，洛苏尔多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具有鲜明的历史批判性，直面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中的自由问题；另一方面，其理论具有极强的人道主义关怀色彩，对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皆有着系统了解，对中国问题有着正向、客观的研究和回答。鉴于过往研究已对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自由观，特别是关于主体异化、群体解放、意识形态、阶级斗争

收稿日期：2023-10-25；修回日期：2024-0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 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20&ZD011)；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1 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2020BZX011)

作者简介：李雨豪，男，山西晋城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联系邮箱：yhli4399@qq.com；郭丽双，女，黑龙江绥化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等基本问题有了较为充分的探讨, 本文选取洛苏尔多为研究对象, 总结并评述其马克思主义自由观, 进而明确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发展方向。

一、洛苏尔多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起源

(一) 现实背景: 殖民主义的不灭与现代人普遍不自由的窘境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 “现代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 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2](402)}, “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404)}, 其建立依托于“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2](401)}, 殖民主义制度与意识形态从外部瓦解了旧有的封建社会。但是,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新的国际政治秩序逐渐构建, 民族国家解放运动高涨, 旧有的殖民主义制度与意识形态在 21 世纪已然呈现出瓦解态势。那么, 一个关于人类自由解放事业的主体与过程的问题随之而来: 现代人的自由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 还是无产阶级斗争与革命事业的胜利, 或是二者相互制衡的“平准化”结果? 无论是掩盖历史, 还是揭露真相, 在不同政治立场的理论构建中, 思想家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大相径庭。如果说苏联解体让西方淡忘了工人阶级在 20 世纪的辉煌历史, 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政治经济批判倒回意识形态批判的研究范式则进一步“掩埋”了共产主义事业对人类解放的实质贡献。由此而来的是阿伦特、施密特、哈耶克、奈格里、哈特等人直接或间接地对世界历史的修正, 资本主义战争与革命被美化成了一场场“圣战”。无独有偶, 随着 1997 年《共产主义黑皮书》的编撰与出版, 共产主义事业被丑化为雅各宾派运动、人为饥荒、阶级灭绝等消极活动, 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被描述为“惨绝人寰的杀戮”^[3]。然而, 自由主义的历史在 21 世纪重新被高歌赞扬, 仿佛现代的一切自由都源于其慷慨的馈赠, 殖民主义思潮再起, 包装之后的“后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等席卷而来。因而, 这就形成了洛苏尔多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第一个现实背景, 即殖民主义的不灭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真正历史的扭曲。

与历史的扭曲同时发生的是现实的窘迫。当我们不再去探讨现代人生活的由来, 而去考察现代人不自由的表征时, 我们便会发现, 无论理论家怎样割裂东方与西方、富人与穷人、文明与野蛮, 他们最后都要面对人类普遍不自由的窘境。旧时代的殖民者在今天仍以文明自居, 物质的丰沛使得其建立起西方独有的政治秩序与“自由”生活, 但到头来“自由”只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当物质财富不再能提供虚假的自由时, 更大规模的掠夺与剥削就会重新到来。第一步是物质剥削的转移。威廉·恩道尔的《石油战争》(2008)一书揭露了 20 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依靠国际金融体系与强权政治联盟的优势, 通过不平等贸易、局部战争等途径开启了殖民掠夺的新模式, 能源与生态负担反而通过定价垄断转移给了发展中国家, 西方社会维持了一种虚假的经济自由。同时, 西方世界正在通过技术垄断和贸易顺差, 以自我为中心, 进行着落后产业的转移, 将生存权益的剥削向外拓展。以此类推, 一种建立在剥削与垄断基础上的自由社会被资本主义强国们圈定起来。第二步是虚假意识形态的灌输。殖民主义从来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言人, 号称只有强者才能支配自由。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是可怕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这是一种压制其反抗意志的精神负担; 对于发达国家内部来说, 这是维持内部等级观念的思想良药, 因而种族隔离、性别歧视和血统论成为一种保护少数人“自由权益”的观念屏障。^{[4](278)}打破西方文明集体自由幻想的是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的数场经济危机, 一场场经济风暴之后, 失业、贫困、战争、饥荒、瘟疫等一次次惊醒了西方社会平准化自由的美梦。伴随着精神世界的空虚、恐慌, 西方理论家和政客们再也难以自欺欺人, 现代人的不自由表征跃然纸上。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原本掩盖在转移剥削与虚假意识形态统治之下的不自由现实暴露无遗, 由此形成了洛苏尔多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第二个现实背景。

在如此现实背景之下,洛苏尔多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批判对象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审视的不自由现实突破了东西方的界限,即同时站在殖民主义受益者与受害者双方的立场上去理解何为自由。作为洛苏尔多的前辈,葛兰西所考察的不自由现实偏向于思想和文化层面,但是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已然证明落后民族与“文化霸权”掌控民族在国际较量中的文化力量的悬殊,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书写仍由少数人执笔。洛苏尔多考察的自由状况亦不局限于阿尔都塞所处的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法国政治和学术环境,不再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进行烦琐的解构,而是更多地解读整部世界史,从世界的另一面审视西方社会,将东西方社会重新归置在一起。因而,我们看到洛苏尔多考察自由问题并不是考察某一次战争或革命之后的社会心理,也没有将自由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或文化问题审视,大规模的失业、饥荒、瘟疫、污染,甚至是血统论与性别歧视等现实问题在他看来才是人类不自由的现实。

(二) 理论溯源:从哲学批判到历史批判

洛苏尔多的作品复杂且跨学科,涵盖政治哲学、历史和社会理论等广泛主题。在早年,他对古典德国哲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它与现代历史的关系,出版、发表了众多著作与论文。但洛苏尔多前30年的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涉及仅停留在了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思想关系的研究上,并没有形成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观。从哲学研究上来看,洛苏尔多这一时期的贡献包括对“友敌”(friend-enemy)和“反历史”(counter-history)概念的探索,他将这二者作为重新评估与批判历史叙事的手段。^[5]客观而言,早期的研究为洛苏尔多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成型提供了方法论工具与哲学底色。通过阅读大量历史文献,他转向对自由主义的研究,由此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行了解构与批判,这开启了他由哲学批判到历史批判的转变。事实上,洛苏尔多的理论成熟与成名更多是因为其在晚年对于人的自由解放问题的追问,以及为此而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他重新定义了“阶级斗争”的概念,并将与反殖民斗争有关的“东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新评估,反殖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亦在其观点中得到了呈现。因而,洛苏尔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成熟于晚年,其理论主要关注人类社会如何实现解放等问题。

从洛苏尔多个人的学术脉络来看,洛苏尔多的思想来源主要是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等人,其治学路径是意大利学界的历史主义哲学传统。在洛苏尔多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历史哲学的相通性。黑格尔“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马克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等特征皆在洛苏尔多的历史批判中有所呈现。一方面,洛苏尔多的历史批判建立在东西方历史的统一叙事中,以阶级斗争为线索,从历史结果着手复现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其历史批判的目的是寻找当代人类社会的出路,破除当下全人类不自由的困境,他的自由观直指全体人类的自由解放。在洛苏尔多晚年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中,我们能够看到其思想实质上深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充满人道主义色彩的伦理关怀。但是这种人道主义关怀并没有渗透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从而成为洛苏尔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诟病的原因之一。

就思想溯源而言,洛苏尔多在充分的哲学批判之后选择了历史批判路径,这是其自由观能够承接马克思主义并做出当代诠释的基础和优势。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政治解放与纯粹哲学批判的否定,历史批判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掌握的批判方式,只有走出形而上学,从社会历史着手才能理解现实并预言未来。马克思《资本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福柯《疯癫与文明》等对资本主义社会不自由窘境的揭露正是得益于选择了历史批判路径。一方面,历史批判通常是基于具体历史情境和实际发生事件进行的,这种方法不是抽象地讨论概念,而是探讨这些概念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体现和发展;另一方面,历史批判往往涉及对社会结构、政治体系、经济发展、文化形态等多个方面的综合考察,这种视角能够更全面地理解社会现象,超越哲学范畴本身,贴近真实的社会历史变迁。

二、洛苏尔多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演进

(一) 重拾黑格尔辩证法

洛苏尔多在《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中声明了其对于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重新审视,其中就包含了对现代人自由问题的思考。关于对黑格尔本人的定调,洛苏尔多认为“黑格尔支持并赞扬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场革命,尽管他被当作一个既存制度的不可救药的辩护人”^{[6](127)}。因而,在洛苏尔多这里,黑格尔是一个历史进步主义者。洛苏尔多认为黑格尔没有偏向自由主义传统,但又不是一个纯粹的保守派,“黑格尔远远不是盲目崇拜似地依恋于金字塔的顶端,他赞颂标志着现代世界诞生和发展的那些革命”^{[6](114)},即黑格尔曾在未正式发表的《自然法及国家科学讲演录》^①中所强调的“革命的进程既可以从君主也可以从人民那里开始”^{[6](129)}。那么这里就会涉及一个黑格尔本人对于反抗权概念的自我矛盾,即不法(Notrecht)的合法性问题:一方面,从《法哲学原理》中描绘的自由王国来看,人不应该具备普遍的反抗权;但另一方面,“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有绝对的权利去侵犯另一个人的所有权”^[7]。因而,在洛苏尔多看来,在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于具体的冲突时,人有绝对的权利去侵犯他人,即当人不自由时,有着为自由而斗争的权利。

洛苏尔多在黑格尔那里找到了人们追求自由的天然权利,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不自由。返回“革命的进程既可以从君主也可以从人民那里开始”的论断,洛苏尔多认为黑格尔承认革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可行性,假设革命合法性是黑格尔所描述的具体冲突中的反抗权特例,那么这就意味着贵族与平民皆存在自由权利被剥夺的窘境,从而证明这种不自由的表征也是双向的。洛苏尔多认为,从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差异性上来讲,黑格尔宣称的反抗权特例实质上是统治者所构建的形式自由没有实现实质自由的特殊情况所以,人类历史中为了自由而产生的冲突是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不平衡的产物,即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换句话说,洛苏尔多认为,与自由主义相比,黑格尔更强调平等而不是自由。那么,这种不平等何来呢?洛苏尔多凭借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找到了答案,既然一个冒着被饿死危险的人会沦落到放弃他所有权利的境地,那么这就意味着奴隶作为客体可以被主人进行《逻辑学》中的“消极的无限判断”,即主体性的剥夺。^{[4](91)}但是如果奴隶的主体身份不被主人所承认,那么主人也就失去了确证自身的主体,双方都陷入了无法被承认的困境。因而,双方在获取新权利与丧失权利的同时打破了权利的平衡,即外在形式自由的失败直接带来了实质自由的失败。故而,从黑格尔这里,洛苏尔多重新拾起了关于自由的沉思,认为人们在具体的自由斗争中实质上是在争取双方主体的互相承认,以形式自由为手段复归实质自由。

洛苏尔多作为一位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学者,当然理解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政治解放的反讽,“我们,在我们的那些牧羊人带领下,总是只有一次与自由为伍,那就是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8]。但是,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在洛苏尔多看来仍不至于要被完全“消灭”,在晚年与复旦大学张双利教授的访谈中,仍可见洛苏尔多对黑格尔法哲学的重视,他认为黑格尔对自由权利的解读与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相通性。^[9]同时,同为黑格尔承认理论的改良者,在与南希·弗雷泽的辩论中,霍耐特更加偏向于对一种“一元论”或基础主义的承认,而弗雷泽却主张以正义为核心的再分配与承认范式,因而造成了双方有关身份政治与社会正义问题的分歧。^[10]但洛苏尔多并没有陷入这一争论,他重拾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想为现代人争取自由准备哲学证明,并不区分道德规范、经济分配与代表权公平的维度差异与先后顺序,而将其统一抽象于“承认”之中。

综上所述,通过重拾黑格尔辩证法,洛苏尔多认为自由的人应当是被全面承认的人。

(二) 重叙资本主义世界历史

通过学习马克思的治学路径,洛苏尔多在进行哲学批判之后亦开始了历史批判,即重释资本主义

世界历史,这一过程的实现主要依靠对自由主义史的批判和对历史修正主义的反驳,在这里洛苏尔多认为反殖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意义重大。

第一,是对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孪生性的分析。洛苏尔多通过批判自由主义发展史,揭露了自由主义的不自由本质,并断言“自由主义的兴起和种族动产奴隶制的散布,是一组孪生的产物”^{[11](42)}。从另一个角度看,洛苏尔多在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2]。洛苏尔多对18、19世纪美国自由主义的批判最为深入。若如托克维尔所述,自由主义意味着所有合法的私人领域享有同等的自由,那么洛苏尔多则断言“习俗”与“偏见”迫使法律转让贫民和黑人自由的美国历史就是远离自由的自由主义历史,而美国宪法中的“五分之三”条款与数位有着奴隶主身份的总统便是对“自由共同体”的最好反驳。在美国这片自由主义蓬勃发展的新大陆上,被殖民者因种族与经济地位而被视作“会说话的工具”,这样一种人的工具化比恩格斯所考察的英国工人阶级更加不自由,因为他们完全被自由主义共同体所排斥。洛苏尔多认为这种来自共同体的排斥在精神教育层面比物质分配层面更可怕,“共同体认为教育是严重的危险之源,这不仅是因为教育有激起不可接受的希望和要求的危险,而且因为教育冒有促进黑人之间观念和感情交流的风险”^{[11](106)}。自由主义通过剥离被压迫者的受教育权利,使得被压迫者内部几乎丧失了实现自由的个体意识与群体认同。内部认同的缺失使得他们失去了相互承认和联合反抗的前提,而禁止不同种族发生性关系与婚姻的立法则让他们在“种族隔离”政策下难以获取反抗权。社会学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双重隔离,使得被自由主义奴役的人们深深陷入不被承认的窘境之中。由此可见,如果殖民主义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而出现松动,反抗的阶级意识根本不会出现,即卢卡奇所述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并且是由发展过程的‘理性的诡计’支配的。”^[13]但是,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欲望必然要求世界范围内的被殖民者们随着产业升级也获得教育,因而英美“白人至上”“富人之上”的社会模式也受到了威胁,这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松动,但这种被动的松动对统治阶级来说是可控的。更可悲的是,虽然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结果虽然也松动了殖民主义制度与意识形态,但他们在今天似乎只是从“劳动工具”变成了“消极公民”,被压迫的民族与个人所获得的承认更像是一种权利的下放与施舍,他们失去了通过“自由劳动”获取相互承认的可能,一种新的“工厂式殖民统治”出现了。^{[11](202-205)}从福特汽车式的流水线作业到今日“加班文化”盛行,从电影和电视创造“被动审美”到今日快时尚行业“制造审美”,殖民主义不再需要铁链和鞭挞就能规训出毫无反抗意识的“奴隶”,这要归功于自由主义利用物质补偿提供的“虚假自我认同”。

第二,是对于历史修正主义中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揭露。洛苏尔多认为历史修正主义的诞生是从将革命思想和革命传统诠释为暴力哲学开始的,它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塑造历史敌人,从而在虚假的道德伦理和虚伪的民主理念中将其反抗的合法性消除。洛苏尔多认为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在当代最突出的表征就是对两次世界大战及相关历史的扭曲,“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修正主义进入更激烈的新阶段的契机”^{[14](60)}。首先是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定义问题,让·饶勒斯(Jean Jaurès)与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Hollweg)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定义这场战争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在后续的历史评论中,历史修正主义者们欣喜地继承了这一叫法,以施密特为首的学者们更是将其发展为西方的“国际内战”“白人内战”,美国的参战更是被美国史学界称为20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其次是对十月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定义,在历史修正主义中,社会主义运动是其设立的历史靶子,是借以划分民主与野蛮、东方与西方、富庶与贫苦的敌手,他们想要在历史叙事中维持道德地位,就必须如《共产主义黑皮书》一样,将纳粹与共产主义作为“种族屠杀”的范式混为一谈。洛苏尔多认为,这样的历史修正主义背后是伴随着西方社会“发迹”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在作祟,他们惧怕过往被其压迫的民族和阶级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因此必须通过修正历史来维护自己的文明形象,并冠恶名于社会主义世界与第三世界。^{[14](83)}如列宁所言,忘记历史就等同于背叛,殖民主义社会的改头换

面不代表殖民主义历史应该被遗忘。洛苏尔多指出西方自身的革命传统让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继承者们惧怕自己的消亡, 因而扭曲历史真相, 用数据统计和比较来为自己的正义与民主正名, 而这样的意识形态欺骗比物质安抚的危害更大。一言以蔽之, 殖民主义的既得利益者想在帝国主义社会及其之后的阶段继续剥削被殖民者的自由, 就要在历史中继续制造“奴性”。这样一种为殖民主义辩护的历史修正主义事实上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 近年来的一些学术报告、影视作品、名人言论等对“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问题的掩盖和扭曲不曾停止。忘却历史就意味着放弃历史给予我们关于自由的启蒙,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反面, 任由殖民主义意识形态麻痹与控制自己。

第三, 是论证殖民主义历史中马克思主义曾作为一种反殖民主义理论出现。洛苏尔多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认可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斗争历史中产生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对殖民主义的反抗中出现了二分, 即马克思主义化身成为反殖民主义理论在东方大放异彩, 西方马克思主义则缺席了反殖民革命。^{[15](35-38)}在洛苏尔多的语境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伤痛与厌战情绪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转折因素; 1917年11月的俄国与东方各国显然没有被激发出同欧陆一样的情绪, 他们被殖民与被压迫的愤怒则激化出了另一种东方马克思主义。洛苏尔多由此认为,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西方, 在被压迫群众中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弥赛亚主义的光环, 人们在饥谨与共产主义社会中偏向于后者。但在同时期的东方, 马克思主义则被视作一种革命的科学, 这种科学工具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等领导人化作了反殖民革命的武器。马克思主义由此在东方作为一种反殖民主义理论出现了, 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合乎实际地表明“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15](16-20)}秉持这样一种态度, 洛苏尔相信列宁所说的, “单一的无产阶级斗争”在东方世界表现为反殖民革命, 帝国主义是现代一切战争的根源, 只是洛苏尔多将帝国主义阶段做了殖民主义的解读。因而在20世纪, 东西方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导致了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东方儒学“入世”的传统更是让马克思主义真正能够“经世致用”。虽不能仅以反殖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冠名, 但是革命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底色仍被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 而这份坚持得益于中华民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反殖民主义历史记忆。可见, 殖民主义中不自由的现实让东方社会拿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 这亦是历史中人类为自由而斗争的缩影。

通过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重塑世界历史是一个独特的视角, 洛苏尔多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的分析方法, 而是将不自由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历史归因, 从历史事实出发, 揭露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生产方式等对资本主义历史的塑造。而这种历史视角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是少有的, 使用这种视角的学者又往往会陷入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中。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强调现代世界体系是在长期的欧洲扩张和殖民活动中形成的, 但是核心国家、半周边国家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复杂矛盾结构却更偏向于经济决定论的解释路径; 《东方主义》的作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通过批判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和误解, 反思了欧洲自由主义思想或文化霸权的产生, 但在某些论述中却颠倒了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的生成关系……因而, 洛苏尔多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解, 使得他并没有陷入一种单一的历史解释范式之中, 而是通过解析反殖民主义斗争史来确证自由权利被剥夺的历史原因和过程。

综上所述, 通过重释资本主义世界历史, 洛苏尔多认为殖民主义历史笼罩下的现代人普遍不自由, 他们在为此斗争。

(三) 重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

在具备了哲学底色与历史叙事之后, 洛苏尔多开始为他的自由理论寻找一条实践路径。延续历史批判路径, 洛苏尔多将阶级斗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进行剖析, 试图延续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研究方法, 从纷繁复杂的阶级斗争历史中去界定斗争的主体、形式、方向和结果, 进而框定阶级斗争的外在表现与内在本质。

一方面,洛苏尔多认为阶级斗争的外在表现是多元主体的多形态斗争。洛苏尔多关于阶级斗争的定义来源于其对《共产党宣言》中“阶级斗争”(Klassenkämpfe)的复数形式解读,即不将阶级斗争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总结,而是将其作为无数反抗斗争的有机综合,因为“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2](420)}。故而,洛苏尔多所要重释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也应当是关于社会冲突的一般理论,这并不偏离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模式和批判模式。但凭借后来者历史观察的优势,洛苏尔多将19世纪之后的历史也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式的考察,将这段时期高涨的反殖民革命、女权运动、宗教与艺术等领域的斗争也纳入了阶级斗争的宏观范围内,并借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近代史论证了一场阶级斗争进行多重目的表达的可能性。首先,洛苏尔多认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之间是天然的种属关系,借鉴列宁“民族问题从属于劳动问题”的论断以及毛泽东关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论述,洛苏尔多申明阶级斗争是“属”,即阶级斗争在一个尚未实现政治解放的民族中呈现出民族斗争的面貌。其次,洛苏尔多将妇女的解放斗争纳入了阶级斗争的范畴,妇女斗争要做的是推翻男人强加给妇女的永久暴政,而要建立男女平等关系的前提是废除社会财富和地位世袭制度,因而妇女解放斗争也是阶级斗争的具体面貌。最后,洛苏尔多认为宗教和艺术在历史上曾作为逃避形式的阶级斗争出现,指责这种做法是纯粹精神愿望的表达,将人和人的历史同自然界相疏离,但真正克服“生命与幸福二分法”的只能是真实的阶级斗争。由此可见,洛苏尔多在扩充阶级斗争形式的同时,打破了斗争主体的身份束缚,以解释阶级斗争作为一般性历史事件的在场性。

另一方面,洛苏尔多认为阶级斗争的内在本质是被压迫者争取承认的斗争。基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洛苏尔多在对阶级斗争的目的进行定义时坚持使用“争取承认”的术语。在他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承认”在这里被理解为主体自由权的复归,即被否定的停止。对于黑格尔而言,“只有当他者是自由的,且他者也被我承认是自由的,我才是自由的”^[16]。无独有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17]。因而,洛苏尔多以此为核心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理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坚持了一种“人的自由必须得到承认”的人文关怀。但是,同样发端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洛苏尔多并没有将其继续应用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而更多地停留在了阶级分析上。因而,洛苏尔多这样的分析就不再纠结于斗争的具体主体、目的和领域。一切被压迫者因为不自由而结合起来争取承认的斗争都包含着阶级斗争的因素,诸如物质、道德、地位等都被抽象为“承认”这一概念。所以,阶级斗争不再局限于宏大的历史叙事,它深入家庭之间、男女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等存在不平等关系的冲突场域。多元主体以不同身份参与不同的斗争,以获得或归还他人主体性的承认,从而共同走向自由解放。

由此观之,洛苏尔多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最终实现手段仍然是阶级斗争,这似乎综合了卢卡奇对第二自然的否定性解读、葛兰西的文化解放、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等人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道德解放、齐泽克的暴力政治斗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理论与社会变革理论,但洛苏尔多的可贵之处却在于其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纷繁理论时的“返璞归真”,他在21世纪重提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并通过扩充其内涵来延续其历史解释力。洛苏尔多通过历史回溯与现实关照证明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没有结束,只是被资本主义语境雪藏,而他用人道主义精神将其召回了。显然,在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打压、历史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历史进行篡改的今天,洛苏尔多的自由观警醒我们,普遍自由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被压迫的人们仍应当联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审视历史、批判现实、指导实践,自由的到来是互动性与过程性的统一。因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重新理解与继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综上所述,洛苏尔多将他所继承的黑格尔哲学具象化于资本主义发展史中,认为人们要在争取承

认的斗争中获取自由。

三、洛苏尔多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整体反思

(一) 洛苏尔多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凝练

关于自由的内涵,洛苏尔多认为自由是人与人的相互承认。洛苏尔多实现了从哲学批判到历史批判的转变,是因为他将黑格尔辩证法映射到了社会历史之中,因而顺理成章地使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解读历史,而这种历史批判的形而上学的源头正是自由权的平等承认。依照上文所述的黑格尔的自由原则,洛苏尔多显然认为自由的真正实现必须依靠自身与他者的“双向奔赴”。从这一理论侧面来看,洛苏尔多并没跳出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理论中全人类走向自由解放共时性的判断。所以洛苏尔多所述的自由是过程性与互动性的统一,自由的具体内涵随着主体性的历史发展而不断丰满,因为人类社会关系因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地更新与丰富。但洛苏尔多将自由的获取能力半数转让给了他者,难免会造成自由主动性的丧失,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相比高下立现。

关于自由的途径,洛苏尔多认为必须依靠一场场争取承认的斗争构成历史合力。从洛苏尔多对资本主义历史的叙述和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解释来看,洛苏尔多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拥趸,他相信阶级斗争这一概念并不指向革命的一蹴而就,而是漫长历史中无数斗争形成的正向合力。故而洛苏尔多反驳了大卫·哈维关于资本主义历史上所有重要革命都是城市运动的论断^[18],他将阶级斗争理论的解释力重新归还于民族解放战争、农民起义等其他形式的革命,这要归功于他对中华民族解放历史和美国黑人历史的比较与研究。同时,洛苏尔多拒绝为近代以来的阶级斗争历史做出经济再分配式的单一结果解释:“如果反抗者们只谴责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回归,不如说是统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对它的永久削弱。”^{[4](339)}因而,洛苏尔多所指的阶级斗争既是一个斗争过程的多重解放,又是一个斗争过程的多元解放。例如,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经济、政治、道德等领域的自由解放归属于每一个参与这场运动的群众,无论是妇女、少数民族、贫民,还是他们的对立面,阶级斗争带来的是多元主体的多样自由。

关于自由的表征,洛苏尔多坚持了共产主义理想,但却沉溺在了人道主义构想之中。在洛苏尔多对于资本主义殖民历史的批判中,隐含着 he 对于人类理想社会的畅想,但他所选择的阶级斗争路径在强调全面性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其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不彻底性,即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从洛苏尔多理想社会的抽象表征来看,他想要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为坐标系,通过现实中的斗争去矫正殖民主义历史、自由主义历史带给人类社会的“创伤”与“后遗症”,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去证明阶级消亡与种族灭绝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能够真正做到主体的完整承认,即自由解放。从这一点上讲,洛苏尔多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唤醒者。但是,一旦回归自由社会的具体表征,洛苏尔多的自由理想就会因对经济问题的降格而重新拥抱人道主义。一方面,相互归还道德称谓的社会如果没有对应的经济所有制的支撑就会沦为道德乌托邦;另一方面,强调各种冲突过后社会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而不去关注物质财富的来源问题,仍然无法解决葛兰西“贫穷和痛苦的集体主义”和托洛茨基“社会化的贫穷”的责难。洛苏尔多通过历史批判论证了共产主义自由的必然性,但却没有直指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造成了社会图景的妥协倾向与实现手段的浪漫倾向。

综上所述,洛苏尔多的自由观在理论选择、政治立场与价值导向上都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选择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而是另辟蹊径地选择了历史批判,以此为共产主义事业与马克思主义正名,但其浓厚的黑格尔哲学底色却没有使其成功地渡过阿尔都塞所述的“认识论断裂”,他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仿佛停留在了马克思 1845 年之前的思想中,仍然充斥着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

色彩。因而,洛苏尔多的自由观是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

(二) 洛苏尔多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论缺陷

洛苏尔多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坚定地选择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批判与演进的线索,并直指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历史批判。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态度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向世人澄清了自由问题仍然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要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简而言之,洛苏尔多的自由观直面了殖民主义历史脉络与现实存续,再次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在对殖民主义历史的揭示中,洛苏尔多用百年来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史告诫我们,人类自由事业不应沉沦于西方殖民主义范式。但是,我们在认可其马克思主义属性的同时,也要正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

第一,洛苏尔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延续轻视了政治经济学。洛苏尔多在以新颖的方式批判资本主义历史时,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力图将民族解放斗争等斗争范式纳入社会主义运动的宏观叙事之中,而民族、性别、职业等并不是一个如“阶级”一般纯粹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如果拿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武器,洛苏尔多就很难在“承认即自由”的哲学叙事中建构其“多元主体”概念,故而洛苏尔多想要在其自由观中自圆其说,就不得不将经济问题弱化到与其他问题同等的位置上,阶级概念的重心从所有制关系中分离。诚然,这不是洛苏尔多这一位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问题,无论是强调暴力政治变革的齐泽克,还是强调结构性社会冲突的米尔斯,各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与政治批判理论中的去阶级化已然成为常态,但不明确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的资本主义批判就是“隔靴搔痒”。虽然阶级概念在现代走向了模糊化,个人身份的变迁与叠加在今时今日变得错综复杂,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剥削与压迫现象的消亡。福利社会与社会结构调整并没有改变收入两极分化,政治经济学仍旧是批判资本主义最好的理论武器。事实上,洛苏尔多在晚年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颇为赞赏,认为它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科学延续,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挑战西方经济范式的成功证明,如果洛苏尔多没有离开人世,或许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迟早的事。^[19]

第二,洛苏尔多所述的自由是一种远离马克思主义本真的消极自由。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两种自由的概念》中提出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两种自由模式,前者强调主体被允许不受干涉地从事自我想做之事,而后者则侧重某一主体有对自由限度的绝对自主权。^[20]马克思所述的自由是积极的,“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165)}。显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猎人”“渔夫”“牧人”“批判者”等田园诗式的描述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已不再是需要他者认同的身份概念,而是一种主体自由劳动的具体表现,而这些自由劳动并不建立于他者的认同之上,劳动的具体结果也不能作为衡量个人社会价值的标准,这种自由不排斥他者,但也不依赖于他者。反观洛苏尔多的自由观,在争取自由的阶段,主体依赖于他者的承认,而在自由完成时亦依靠相互承认来持续。虽然这是对殖民主义历史中“排他者自由”的一种批判,但是如果将对压迫者的改造寄希望于历史批判之后的道德洗礼与政治约束,而不是彻底的经济改造,那么这种相互承认的自由无遗是脆弱的,自由赋予权的天平仍然会倒向生产关系的优势方。因而,洛苏尔多这种寄希望于他者的“赋权型自由”并不是自我的“权能性自由”,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21]

第三,洛苏尔多的自由实现路径的可行性存疑。诚然,现代文明的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已然复杂化,任何一种具象化的社会冲突涉及的主体与矛盾都是复杂的。例如,19世纪美国种族问题的冲突范式与21世纪的显然是不同的,政治矛盾、经济矛盾如今被包裹在道德问题的外衣下,在畸形的反歧视斗争中持续,美国的有色人种似乎达成了一种“道德解放=现实解放”的共识。^[22]用洛苏尔多的阶

级斗争理论来看, 这样一种为承认而斗争的范式似乎是符合法哲学逻辑的。但是, 从现实性出发, 阶级社会的道德制定者仍是统治阶级, 标榜道德平等与自由的反抗形式在国家语境中极易达成虚假的平衡状态, 统治阶级仍可利用意识形态的编排与教育去控制这类争取承认的斗争。关键在于道德解释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少数人占有, 现实中的被压迫者难以证明其阶级意识的独立性和斗争结果的真实性。^[23]因而, 当代西方社会虽然仍普遍存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职业歧视等问题, 但西方的社会政治已然熟练掌握了对相关社会舆论与压力的控制与转移, 规模性的民族、性别、工人反抗运动已成为历史。洛苏尔多理想的多元化阶级斗争在当代平和的社会环境中难以形成, 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示威游行、媒体论战及民主票选等斗争手段。尽管洛苏尔多在《非暴力: 超越神话的历史》中赞扬非暴力革命作为后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作用, 但非暴力运动的历史功绩并不能证明它现实可行。^[24]想要实现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彻底承认, 就要让宏大历史斗争与微观社会冲突相统一, 让非暴力运动与暴力革命相结合, 但资本主义现代性突出个体权利, 原子化个人的反抗“各怀鬼胎”, 每个人想要争取的“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各不相同, 所以洛苏尔多所期盼的斗争合力的可行性存疑。另外, 数字时代到来, 人们大多困于数字劳动与平台资本之中, 数字资本主义的自由困境显然也是洛苏尔多在历史批判语境中难以解决的, 因而其理论的历史解释价值并不能代替现实功能价值。

总而言之, 洛苏尔多的自由观指明, 现代人的自由问题与去殖民化进程息息相关, 民族间的偏见与区域间的误解根植于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积累与增值的历史之中。殖民主义在当代并没有消亡, 它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生产方式伴生而行。因而, 在西方中心主义盛行的今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依靠自主的理论、制度与道路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立自主。^[25]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世界历史与现实间的张力之中,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注释:

- ① 洛苏尔多在《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中介绍了三部未曾由黑格尔本人公开的有关《法哲学原理》的手稿, 其中《自然法及国家科学讲演录》由黑格尔档案馆于1983年公布, 德文为Rph. I, 本文引用时标注的为《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的页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EB/OL]. (2018-06-23) [2023-10-20]. https://www.gov.cn/xinwen/2018-06/23/content_5300807.htm.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3] PANNÉ J L.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M]. KRAMER 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32.
- [4] LOSURDO D. Class struggle: 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history[M]. ELLIOTT 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16.
- [5] AZZARÀ S G. Domenico Losurdo 1941-2018, In Memoriam[J].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19(2): 314-325.
- [6] 洛苏尔多. 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M]. 丁三东, 等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8.
- [7] HEGEL G W F.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M]. NISBET H 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55.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
- [9] 张双利, 倪逸恩. 今天为什么要重读黑格尔的法哲学——意大利哲学家多米尼克·洛苏尔多访谈录[J]. 探索与争鸣, 2017(5): 69-75.
- [10] NANCY F, AXEL H. 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M]. New York: Verso, 2003: 24-53.
- [11] 洛苏尔多. 自由主义批判史[M]. 王崇兴, 张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97.
- [13]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35.
- [14] LOSURDO D. War and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M]. New York: Verso, 2020.
- [15] 洛苏尔多. 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 诞生死亡与重生[M]. 李凯旋, 李赛林, 译.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22.
- [16] HEGEL G W F. Werke in zwanzig Bänden Vol.10 [M]. Berlin: Suhrkamp Verlag AG, 2011: 220.
-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55.
- [18] HARVEY D.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M].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0: 243–244.
- [19] LOSURDO D. Has China turned to capitalism?—Reflections on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J].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17(1): 15–31.
- [20] 伯林. 自由论[M]. 胡传胜,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67–221.
- [21] 陈培永. 关于马克思主义自由论当代建构的几点思考[J]. 求索, 2021(1): 13–19.
- [22] 汪诗明, 王艳芬. 种族歧视·种族主义·种族和解[J]. 史学集刊, 2016(2): 89–99.
- [23] 李雨豪, 郭丽双. 洛苏尔多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研究[J].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24(3): 52–67.
- [24] AZZARÀ S G, PEGORARO L. The non-violence movement and its contradictions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y—A review of non-violence: A history beyond the myth by Domenico Losurdo[J].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17(1): 120–133.
- [25] 李新廷. 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理论——后发展国家与中国经验视角的反思与重构[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4(2): 117–125.

Out of colonialism: Losurdo's Marxist viewpoint of freedom

LI Yuhao, GUO Lishuang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Colonialism, rather than disappearing in contemporary times, has evolved alongside the liberal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Domenico Losurdo shifted from philosophical critique to historical critique, elucidating through Marxist language the liberal view of freedom vis-à-vis colonialism. Under the social background where colonialism persists and modern individuals are generally unfree, he draws on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to approach Marx's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surdo points out that true freedom should be universally recognized, rooted in the right of resistance possessed by individuals under oppression. Thus,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by the oppressed in capitalist history is essentially a legitimate pursuit of freedom. By integrating this viewpoint with Marxist theory of class struggle, Losurdo, with being recognized as the goal, reshapes the theory so that the emancipation movements for freedom can all be covered in pluralistic forms of class struggle and the concept of class is actually expanded. However, he drifts towards a departure from Marx's own conception of negative liberty and fails to thoroughly critique the economic logic of colonialism. In light of his insight,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ies of freedom must adhere to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and navigate the tension between world history and reality, emphasizing a human-centric approach while embracing a glob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Marxist viewpoint of freedom; Domenico Losurd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lonialism; theory of recognition

[编辑: 郑伟]